

■作家走读中梁宝龙百悦文创小镇·作品选登

用时间记录一条解放街

杨方

每个城市都有那么一条街成为人们的记忆中心。北京的南锣鼓巷,成都的锦里,西安的回民街,武汉的黎黄陂路,厦门的中山路,天津的文化古街。

解放街,应该是永康这座小城的一条记忆路径。

在我没有进入这条街之前,它只是一个词。我无法跟随一个词进入它的内部。六七岁的时候,父亲从老家回来,送给我一把画着黛玉葬花的折扇,说是在老家一条叫解放街的街上买的。我想象不出解放街是一条怎样的街,在伊宁有斯大林街和汉人街,都是东西走向的街道,每天正对着落日,每到傍晚,整条街道闪闪发光,耀眼得让人睁不开眼睛,仿佛街道一直铺到了太阳里。父亲描述中的解放街跟斯大林街和汉人街大不一样,它不是笔直的,也不够宽阔,没有公交车,甚至没有红绿灯。和伊宁的街道相比,解放街只能算是一条小巷子。

父亲的描述是抽象的。一个人只有与一条街相遇,才能具体地熟知它的一切。在没有与这条街道相遇之前,除了一把漂亮的折扇,这条街的一切都与我不关。

1984年,我第一次从解放街走过。我从街的这一头进去,从另一头出来,就像被一条蛇吞进了肚子里,然后它又把我拉了出来。

一条街没有办法消化掉我,因为我是一个有记忆的家伙。我记住了它的窄、它的弯曲、它的拥挤、热闹、乱糟糟,狭小店铺里的肉麦饼以及摇着蒲扇卖杨梅的胖女人,她把阔腿裤卷起来,露出白而肥的大腿,让我想起鲁迅笔下豆腐西施之类的人物。

在永康几年,我知道这条街上有一家理发店,我在店里把长头发剪成了短头发。有一家眼镜店,我在店里配过一副眼镜。还有一个邮局,我往那个绿色邮筒里塞进过很多封信。1988年,邮局门口的法国梧桐树上结着毛毛的小球球,我走进邮局给姐姐打电话,姐姐说父亲让我回新疆。我放下电话,一个人走过解放街,街道拥挤,提着菜篮子的女人急着赶回家烧饭。她拐进武义巷消失在一扇门里。她被这条街消化掉了。而我是这条街的一个过路人,它没有办法消化掉我,它最后像吐骨头一样把我吐了出去。

1995年,爷爷过世,我赶回永康,送走爷爷之后,我从解放街走过,看见一个小小的鲜花店里摆着白色的菊花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条街开始有了卖鲜花的店铺。我想起应该给爷爷买几朵菊花。

1998年,我回到这个城市工作。夏天的时候我刚去过西藏,高原的太阳把我晒得很黑。我坐在解放街的一家面馆里吃饭,另一张桌子上一个白净的女人用永康话说:看啊,这个外地人多黑啊!我听懂了她的话,感觉自己坐在那里,与这条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。这条街是江南的、婉约的、纤细的,我出现在这条街上是一种破坏。

我有点想不明白,我走了一大圈,怎么又走回到了这条街上。

那时候,这条街的一部分正在拆迁,旧木料成堆堆在那里,碎玻璃满地闪耀。残垣断瓦间,拆走了门板的门框,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。我在一个晚上走进这段拆了一半的解放街,遇见一个和我一样在废墟间游荡的人,他可能想回到他曾经住过的地方,再看看那些熟悉的场景。那个晚上,我还遇见过一只狗,它在我身后跟了很久,我怀疑它是一条被这条街遗弃了的流浪狗。后来这条街拆掉的部分,盖起了高楼,修建了新的街道和广场。我在小说《在废墟上撒》写到了这条街拆迁时的废墟,还有广场。

2009年,父亲最后一次回永康,父亲的童年玩伴庆生来看父亲,两个将近八十岁的孩子,站在和他们一样衰败的剩余不多的解放街握手告别。大家心知肚明,这一次告别,是生当作死别,是真正的永别。看着庆生沿着老旧不堪的解放街走远,走路不便的父亲竟然跟出去好远。他想跟庆生再说一句话,可是他怎么追也追不上前面的庆生。后来父亲站立不稳,差点摔倒,一个开店的人扶父亲在凳子上坐了一会,父亲才有力气走回来。我站在解放街口等父亲,我真怕父亲和这条衰败的街一起消失。我知道他们都会消失。那种不远的看得见的消失,让我害怕,让我不敢去想。

直到这一年,我对这条如父亲般衰老的解放街突然有了深深的不舍,我希望它一直在,永远不要消失,仿佛只要这条街在,父亲就能够从它零落的人群中走出来,出现在我面前。

2018年,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,解放街已经从这个城市彻底消失,仿佛是它的消失带走了我的父亲。它成了我脑子里一根疼痛的记忆。很多时候,我在这个城市得特意绕开它,不去触碰。

但对于一直在这座城中生活的人,解放街是很多人的童年、少年、初恋,或者难忘的时光。它的消失,是一种伤感,也是一种重生。我相信父亲死后,将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来,解放街也是。它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。地产双雄中梁与宝龙落子永康解放街,他们将在这块历史底蕴丰厚的地方,缔造高端住宅——中梁·永康府。永康的地图上,解放街不再存在,从此永康府,这个大气、恢宏、响亮的词,将和它的高楼一起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。不知道那时候这座城的人,是否还会想起,在这个城市最中心的地方,曾经存在过一条如河流般缓慢的解放街。

杨方,出生新疆,现在浙江生活,自由写作者,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-2014年驻校诗人。曾获《诗刊》中国青年诗人奖、华文青年诗人奖、扬子江诗学奖、浙江优秀青年作品奖、《北京文学》优秀短篇小说奖。近两年,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上海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发表诗歌和中短篇小说。有小说入选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中篇小说月报》《中国中篇小说精选》等。

穿过一座城去看你

金慧敏

小时候,住在永城往南十五里的乡下,父亲在城北的拖拉机厂上班。那时父亲开大货车,全国各地跑,回家的时间并不多。偶尔母亲去城里赶集顺路看下父亲,但这种事是不常有的,母亲更愿意去生产队挣工分,因为家里总是缺粮。若能跟母亲一道去,对我们姐妹来说当然是高兴的事。儿时赶的集是什么样的,我忘记了,但是从家里到拖拉机厂一路的经历倒似一帧帧发黄的照片,留在我记忆深处。

通常过了下楼双锦,母亲就会抄小路走。从此地到彼处全靠11路的那个年代,能少走几步路都是好的,况且我们都还太小,走不了太远的路。那时四中附近没有房子,一边是水田和桃林,一边是永康江,我们就沿着永康江边的小泥土路走到下园朱,再往前要经过西津桥。桥下是流水,桥板是朽烂的,总是这儿少了一块板,那儿破了一个洞,那些尚存的桥板也好像随时都会像跷跷板一样翻起来。我总担心一不小心脚就卡在哪个破洞里,或者直接就从更大的洞掉到桥下去,战战兢兢,不敢迈步。小心翼翼过了西津桥,沿着溪下街,就了解放街,穿过解放街就相当于穿过了一座城,那时的永康城,的确是太小了。解放街的尽头就是老汽车站。过老汽车站是红卫布厂、医药公司、城关五金厂。当我经过这些单位门前时,总是特别羡慕里面端着铁饭碗的人。

去拖拉机厂找父亲,也不过是一家人吃顿饭而已。父亲并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安顿我们过夜。住招待所,又不舍得花那个钱。通常一次探望往返需要走上差不多三十多里的路,对于幼小的我和姐姐来说,那是不折不扣的远足,但记忆中却并没有累的感觉。一家人在一起吃一顿中饭,足以抚慰我们赶路的疲累和饥肠辘辘的肠胃。即使到现在,我依然觉得人间最美味的食物,就在那个有着油腻的水泥地、能容纳上千人就餐、每个窗口都飘着诱人饭菜香味的食堂里。让人垂涎欲滴的饭菜香早就把我们姐妹的馋虫都钓了上来。我往后的人生中,再没有闻到过有胜过永拖食堂的那热烈、饱满、勾魂摄魄般引人食欲的香气。

周末不出差的时候,父亲会沿着相反的方向,穿过解放街,穿过一座城,回到乡下与我们团聚。我们的往与父亲的回,一样让人期待。在那个信息不通的年代,我们不知道父亲哪个周末会回来。每到周末,我和姐姐在夕阳西斜的时候,会循着父亲回家的路等在邻村的村口,有时接到父亲,欢天喜地地蹦跳着回家。但更多的时候,我们并没有接到提着黑色皮革包的父亲,失望地回到家。父亲回家的日子,就像过年,因为父亲黑色的皮革包,每次都能掏出一两样零食来。这是让同村的小伙伴们特别艳羡的事。最让我们欣喜的是,有一回父亲竟然带回来一只比暖水瓶更大一些的冰壶。夏天,父亲就用厂里发的棒冰票买一壶的白糖和绿豆棒冰回来。走过那么远的路,壶里的棒冰丝毫没有化开,依然是硬邦邦的。

后来,我们有了弟弟,就没有机会再跟着母亲,穿过解放街,去拖拉机厂看望父亲。好在,有了弟弟后,父亲买了一辆凤凰自行车,出差也少了,回来的次数自然就较之前多了。等到父亲终于可以把穿过一座城的母亲和弟弟安顿住下的时候,弟弟已经去了职工子弟小学上学,而我也已经小学毕业了。

母亲从山的那边嫁到山的这边来,都说田洋比山坑好,不用那么辛苦,不知道饱经艰辛的母亲有没有后悔过,在田洋的日子着实过得比山村更累。我记忆的镜头里没有父母秀恩爱的画面,父亲和母亲在最美好的年华里无数次地穿过一座城往返奔波,也许正是那一次次的奔波和一个个脚印的重叠,才使每一次的相聚都如初逢的美好。后来父亲和母亲终于安居在城市的那一头。父亲走后,母亲执意回到城南的老家居住。她说:根在这里。

是啊,穿过一座城去看你,你若不在,点滴回想都是心痛。曾经无数次经历的路途中不再有溪下街,不再有解放街的十字路口,不再有八间店——斯人已去,每次奔波都不会再有终点的守候。再过些日子,将会有一个叫做百悦文创小镇的商业街区拔地而起,而那些曾经奔波往返的爱情、亲情终将在一段烟尘中成为记忆中永远的定格,温暖曾经的过往和余生。

金慧敏,永康市作家协会会员,私营企业从事财务工作,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报纸、杂志。



解放街区的老巷弄 西街
林群心摄于2010年

中梁·宝龙广场

永康府

（推广名）

解放街 36万方国际综合体

0579-87016666

（面积表述为建筑面积）

永康市作家协会会员

私营企业从事财务工作

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